

在缅甸，邂逅书迷和“街边大学”

■唐颖

1995年，美国作家艾玛·拉金第一次到缅甸，她发现无论去哪里，都能看到人们在阅读。在她所住的旅馆外，经常看到三轮车夫躺在三轮车破旧的椅垫上，读着杂志或书籍。有时候，还会看到三个人弓着背看同一本书。

有个老妇人在一场火灾中失去了房子和一切东西，她告诉拉金，她最思念的是她的藏书。她提到一本狄更斯的小说，作家形容道，“仿佛在喃喃自语久违的情人名字：‘《远大前程》’”。这让我思绪翻滚，想起自己年少时沉迷在狄更斯的小说里，那是些转换多次后书页已掉落没头没尾的书啊！以后在大学，重新阅读经典，才把失落的书名给补上。我们的外国文学课老师王智量先生是翻译家，他也授课英语高级班，用的教材便是《远大前程》，我去旁听过一次课，大量的英语生词让我知难而退了。

“你读过查尔斯·狄更斯吗？”“莫泊桑呢？”“西德尼·谢尔登？”“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在茶馆，坐在拉金身边的缅甸男子一叠声地问道，可对于美国人，这都是多少年前读过的书。“告诉我，《化身博士》讲了些什么？”美国作家很为难，这本书她读过太长时间了。

而另一名男子，试图用艾米莉·勃朗特小说《呼啸山庄》场景与美国男子搭讪，男子希望女作家帮助他学英语，并提议就像书中的小凯瑟琳曾经教过哈里顿那样，答对一个问题就得一个吻，见女作家疑惑的神情，他告诉她去核对出处，“企鹅版，第338页。”

这景象很像中国开放早期的上世纪80年代。一名在复旦读国际金融的女生告诉我，她在外语学院附中读书时，周末常去外滩一带，追着老外练外语。她读英语原版小说，能背诵《简爱》的段落，崇拜美国作家薇拉·凯瑟，熟读她的小说《My Antonia》（我的安东尼娅），这本书是一位



▲▲ 潘索丹大街被称为缅甸的“街边大学”，书摊密布，绵延整条街。

▲ 本文作者摄于缅甸仰光“书店街”潘索丹大街的一家书店。

芬兰朋友送她的旧书，女生去美国留学前又转送给我。这本书转手了好几次，很多书页有不同笔迹的英语句子，是一些读者留下的心得和感叹。

艾玛·拉金的非虚构作品《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成了我们缅甸行的人文指南。书中对于缅甸人热衷读书的描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也颠覆了对于缅甸的想象。有个叫埃敏的缅甸人，从20岁开始就隐居于父母留下的两层木屋里，专心读书。40年来，他在二手店寻书，光是英语原版书就超过1000册。埃敏把他的书都存放在行李箱里，每一本书都用塑料袋仔细包好，以防热带潮湿的气候下白蚁和霉菌的侵蚀。

回想我们进入大学后就开始订阅的《外国文艺》《世界文学》杂志，也许对西方文学，比普通的西方人还了解，至少，热情程度更高。他们来到中国遇到我们，也有过为难的片刻。那时西方的现代主义作品刚刚涌入国内，便热衷于和西方旅人聊意识流小说比如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山的雪》，或者黑色幽默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诸如此类，这些书我们刚刚读过，可对于他们是久远前的阅读。当我们用某本书的细节来开启关于现代派小说的讨论时，他们可能会尴尬，也许这是他们高中时读过眼前已经模糊的

书，无法用等同的清晰表述来回应我们。

《世界电影》和《外国戏剧》杂志，每一期都有一部著名的电影剧本和获奖戏剧剧本翻译进来。当我们和老外聊起电影史上脍炙人口的电影时，他们难以置信我们刚从封闭的年代过来。记得有个在大学读戏剧博士的上了年纪的荷兰女子（她是等儿女们成年后才去读学位的），因我们几乎和她同步的戏剧知识，而泪湿蓝色双眸，她被我们如此饥渴的读书状态深深触动。

在仰光的第一个白天，我们从酒店出来，才走了一个街口，便来到潘索丹大街，这不正是拉金在书中提到的“书店街”吗？原来，缅甸有很高的识字率，全拜这个国家的佛教寺庙保有浓厚的教育传统，经过几代殖民和印刷术的引进，在英国治下，阅读是广为流传的休闲方式。

然而，在军政府时代，大学因学潮经常被关闭校园，停停开开，有些学生历经六七年都无法从学校毕业。在这条街，在密集的书店和书摊，人们可以找到获得知识的途径，因此缅甸人把潘索丹大街称为“街边大学”。

这条街就在苏雷塔附近，穿过仰光市中心，有高架桥进出口，是一条交通繁忙的街。我们站在街牌下拍照留念，阳光耀眼行人

如织，心情也变得雀跃。可是，站在街口四顾张望，潘索丹大街已经不是拉金在20世纪90年代看到的景象：“书店鳞次栉比，卖书和杂志的摊铺几乎铺满每一寸人行道，触目可及的都是书，成堆地摊在地上或临时木架上。”

我们沿街走了十几米，一眼瞥见对马路的书店。就像觅宝一样，等不及走向交通灯下，便朝马路对面冲去，那是种什么心情呢？就像一样好东西失而复得！

书店不大，有三五顾客，缅甸英文都有，楼梯口两边的墙上，像贴照片一样，将书封面富于装饰感地排放在大镜框里，却都是英文书籍；另有镜框贴着英文版《读者文摘》杂志封面；《奥巴马传》和英语版的《商业周刊》被放在醒目的位置。受英国殖民文化影响，缅甸部分人群精通英语。但显然，英语书比缅甸书昂贵得多。

由于在仰光只待一天要赶好几个地方，我们匆匆离开，虽然又看到几家书店，也只能略过。

这晚因朋友生日，我们去了仰光有名的时尚餐馆Tea House，吃了一顿在缅甸旅途最昂贵的晚餐，然后发现，这家餐馆就在潘索丹大街。想想就明白，为何这条街的书店在减少。现在的缅甸正走向开放，随着投资商们的进入，市中心的租金也水涨船高，书店从来不是利润丰厚的买卖，只能从

高租金街区搬走。

不过，十天后我们结束旅程回到仰光，在酒店附近一条小街，见到了绵延整条街的书摊，就像“街边大学”搬到了这里。这条街的两边人行道上，书摊紧密相连，有几百米长，放书的木板下垫着色彩鲜艳的塑料小凳子，顶上有蓝色为主间隔一两块红色的篷布，色彩悦目。不少摊位，书和杂志堆得老高，快要碰到顶上的篷布。

书摊上多是二手书，杂志占了不小比例，缅甸英文都有。在书摊里面一侧，还隐匿着一些小书店。其中有间书亭，亭子上方贴有一条招牌，用英语写着Myanmar Writers Association（缅甸作家协会）。看书亭挂出的书，有些封面的书名是双语，英文下面一行是缅甸文，也有书名只写缅甸文的儿童书。

其实，缅甸到处都有书摊。我在老蒲甘的寺庙门口书摊，用三美元买了一本乔治·奥威尔的原版书《Burmese Days》（缅甸岁月），扯去透明塑料纸包装翻看，竟是复印本。同行的新加坡友人十多年前来过缅甸，说她当时用两美元买了这本书。这次她买了奥威尔的《Shooting an Elephant》（猎象记）和艾玛·拉金的新书《No Bad News For The King》（国王没有坏消息），当然，也是复印本。

这恐怕是盘桓在众多怀揣着灼热文学梦想的年轻学子脑海中共同的记忆：刚进大学之际，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师无情地泼下一瓢冷水，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一锤定音，他们的文学梦刹时间破灭了。虽然长时间里文学写作无法登堂入室，但校园中的创作始终繁荣发展，各类文学社团茁壮成长。而来自大洋彼岸温煦的暖风更是令人鼓舞，早在上世纪前半叶，文学创意写作专业便在北美的校园中扎下根，如今已是根深叶茂，蔚为大观。为何不能在我们的校园中让创意写作成为满足莘莘学子文学梦想的通途呢？

自十多年前王安忆教授加盟复旦中文系后，大学生的文学梦想在校园中有了更为切实的体现。复旦中文系于2006年设立了“文学写作”专业，如今在文坛崭露头角的甫跃辉和张怡薇就是该专业的毕业生。后来经过陈思和教授和王安忆教授的不懈努力，2009年教育部正式批准设立中国大陆第一个MFA“创意写作”硕士点。到今年

为止，已经招收了近十届学生。

MFA文学创意写作专业在复旦已开设多年，但对“写作能不能教”这一核心问题，依旧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很多同行暗地里也在质疑。反思几年来的教学实践，我们意识到有些东西的确无法教授：我们无法改变一个人的先天生理因素，我们无法任意赋予学生一具具有艺术气质的肉身，我们也无法培养他们强大的创作内驱力，更关键的是我们没有那种专横超凡的能力去塑造他们的人生。但是在复旦这样的校园里，在浓郁的文化氛围的熏陶下，我们可以将技巧传授给学生，在技术层面上让他们得到显著提高。

就像王安忆老师说的，在我们MFA

专业中，老师跟学生组成一个创意工作坊，这样的氛围极为独特。一个人孤独写作享有很多好处，但缺乏必要的交流和刺激，最后也会陷入一种困境，而师生之间这样一种难得的交流氛围是该专业最具特色的地方。更关键的是，想象力也能在其中激发出来。这种想象力不仅是从经验出发的虚构能力——就像刘勰说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想象，还包括一种超越生活现状的冲动、一种乌托邦式的激情与冲动。没有这种东西，再强大旺盛的文学想象力也会无用武之地。试想一下，人们为什么那么喜欢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人们喜欢那个傻乎乎的骑士，是因为人们可以从他身上发现自己的梦想，因为

那种近乎癫癫的、想要改变世界的白日梦，埋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底。这种乌托邦的梦想依旧是文学最大的动力之一。

我们无法期望一夜间培养出著名的作家，而且绝大多数同学毕业以后也不会成为职业作家，但这两年时间对他们的人生还是很有意义的。他们在此期间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这将成为他们各自人生中最美好的篇章——而这正是人文教育的精髓之所在。

我觉得，经历这两年创意写作的学习，就像邂逅了一段短暂的夏日恋情：正因为短暂，所以才更美丽。波兰诗人辛波丝卡在《一见钟情》的诗句对此写得可谓淋漓尽致：

他们彼此都相信
是瞬间迸发的热情
让他们相遇。
这样的确定是美丽的，
但变幻无常更为美丽。

文学创意写作的美丽

王宏图